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以發生在俄羅斯聯邦的韃靼共和國和車臣共和國的分離運動為研究對象，探討民族分離運動的相關問題，包括民族分離意識興起的原因以及影響分離運動往不同路徑發展的因素為何。由於俄羅斯屬於前社會主義國家，國家體制曾經歷轉型的過程，因此除了具有一般民族問題的特質外，還必須考慮多重轉型的特殊性。

在我們研究的兩個主題中，本文認為原生性的血統、語言、歷史記憶等條件，以及政經利益被剝削的相同感受都會造成「我們」與「他們」的區隔，因此原生與利益因素都是促使分離意識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中，除了原生差異與政經利益的影響外，分離團體的形成還必須考量特殊的制度因素。這個制度因素指的是蘇聯時期施行的聯邦制與本土化政策。聯邦制提供族群團體被正式承認的生存疆界與共同命名，有助於將族群的認同從地方性轉變為鄉土的概念。在形式上，加盟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也擁有自己的憲法及相對應的政府機關。本土化政策的實行則強化了少數民族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本土性，意外地導致排外意識興起。由此看來，制度的施行更加強化了族群凝聚力，將族群的差異性正式區別開來，創造了潛在的民族分離團體。韃靼共和國與車臣共和國便是在上述的脈絡下被成立創造出來。從帝俄到蘇聯的統治，在制度的配套下，這些族群團體的性質已經改變，他們從少數民族的地位進一步轉變為實存的政治體，甚至要往民族國家的方向發展。

潛在的分離團體形成後，假使中央能以強大的力量加以控制，那麼還可以勉強抑制分離運動的發生。一旦中央的控制力有了鬆懈的跡象，那麼這個分離意識便有了發揮的空間。在蘇聯末期，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調整了中央極權控

制的緊度，政治派系的鬥爭又暴露政權鬆動的現象，這正好提供分離團體活動的大好機會，骨牌效應蔓延整個蘇聯體制，民族分離運動的爆發演變為一波波不可抗拒的浪潮。

那麼分離運動怎麼會往不同的方向發展呢？雖然作為動員基礎的原生性條件以及工具性訴求或多或少會影響分離運動的強弱度，不過動員的方向卻是由領導人來決定，所以我們認為分離運動的發展取決於領導人的立場與決策。為了證明這個論點，我們也特別挑選了俄羅斯聯邦的韃靼共和國與車臣共和國做為案例研究，說明不同的領導者是怎樣領導分離運動的進行，導致分離運動的發展有不同的結果。

在我們的研究案例中，夏米耶夫是韃靼共和國分離運動的領導人，他出身於共黨體制，所主張的分離運動立場較為溫和，相較於激進的民族主義份子對於領土主權的要求，他強調的是實質面的經濟利益自主權。車臣共和國分離運動初期的領導人為札夫加耶夫，同樣是出身共黨舊菁英的札夫加耶夫在分離運動的立場上甚至比夏米耶夫更保守。由於領導者的不同態度，夏米耶夫在分離運動的發展初期便提前完成牽涉共和國主權議題的主權宣示及總統選舉等動作，而札夫加耶夫所領導的分離運動則是落在其他共和國分離運動的發展之後

兩者的對照情形在杜達耶夫成為車臣共和國分離運動的領導人之後呈現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札夫加耶夫政權為杜達耶夫取代後，杜達耶夫除了進行總統選舉之外，不斷表示主張車臣獨立的決心，也拒絕接受韃靼模式的約束。相較於杜達耶夫的激進手段，夏米耶夫則顯得較為溫和保守，他利用各種談判妥協的方式周旋於共和國內部的民族主義力量與莫斯科之間，最後以雙邊協約解決與莫斯科關係界定的問題。

杜達耶夫的出現與路線抉擇改變了車臣共和國分離運動的發展，這不僅證明領導者策略抉擇在分離運動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點出了社會主義國家民族問題的另一個特點。發生在蘇聯的分離運動中，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原本是共黨菁英的共和國領袖通常會是開啟分離運動的帶領者，這在韃靼共和國與車臣共和國的情況中也是一樣的。但也正是因為蘇聯崩解的特殊情勢，政治不穩定使得分離運動領導者的變動可能性跟著提高，領導人、內部的民族主義力量及莫斯科三邊的互動關係相當程度地影響領導人能否繼續主導分離運動的發展。韃靼共和國與車臣共和國的研究案例便提供了這個有趣的觀察點。同樣是出身共黨舊菁英的夏米耶夫與札夫加耶夫，在八月政變之後都面臨了民族主義力量與莫斯科的雙面夾殺，夏米耶夫安然度過危機的同時，札夫加耶夫卻狼狽下台。

解析這兩個案例的三角關係後，我們發現韃靼共和國的夏米耶夫策略得宜，他小心處理與民族主義力量及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在三邊關係中維持中立與優勢地位，因此才能穩居分離運動領導者的位置，接著以自己偏好的路線完成分離運動的政治目標。在車臣共和國的情況中，由於哈斯布拉托夫與葉爾欽個人政治野心的介入，札夫加耶夫成為政治犧牲品，不得不退出權力角逐，杜達耶夫才趁勢成為分離運動領袖。這個來自中央的突發因素說明，中央對於分離運動的態度有可能基於個人權力的考量選擇支持或不支持民族主義勢力，這個干涉行為造成分離運動領導人的更替，使得中央回過頭來要處理分離主義的問題時顯得更為棘手。

由俄羅斯聯邦內各個自治共和國發起的分離運動在韃靼模式建立後逐漸平息，車臣共和國的分離運動引發了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的第一次車臣戰爭，一九九九年十月起則又爆發了第二次車臣戰爭。迄今，車臣問題仍是莫斯科最頭痛的問題。

為了預防可能危害領土完整的民族分離運動再度爆發，俄羅斯總統普欽上台後也陸續採取一連串措施。普欽首先進行聯邦制的改革，他下令將全國劃分為中央、西北、南部、伏爾加河沿岸、烏拉爾、西伯利亞、遠東等七大聯邦區，並分派總統全權代表負責監督聯邦憲法和法律在各區執行情況。¹（參考圖 5-1）這個聯邦制改革的用意之一便是要以區域性行政劃分來沖淡原本民族性濃厚的行政區域。在車臣問題的解決方面，普欽雖然開啟了第二次車臣戰爭，又不斷介入車臣共和國的內政問題，可是他同時也表示加強對車臣的財政補助與經濟重建工作，甚至於在今年三月還主導車臣共和國進行憲法等議題的公民投票。由這些恩威並施的手段看來，普欽確實致力於避免分離運動於俄羅斯聯邦再度爆發。至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斷定這些政策的成效如何，然而可以確定的是莫斯科政府仍會持續面臨少數民族問題的挑戰。

本文的研究主題為發生在俄羅斯聯邦的分離運動，然而由於現實條件的侷限，僅以韃靼共和國及車臣共和國為探討案例不免漏失其他重要的影響因素與更多值得探究的問題。俄羅斯聯邦的組成中包括了二十一個民族共和國，倘若能針對所有的共和國進行比較，相信對於俄羅斯聯邦分離運動的問題更能提出完整的解釋途徑。最後，這份初步的研究尚期盼更多的研究及讀者們的批評與指正。

¹ 各區詳細資料見俄羅斯聯邦土地資源委員會網站資料：<http://www.goscomzem.ru/statist.htm>

圖 5-1：俄羅斯七大聯邦區



資料來源：<http://www.goscomzem.ru/statist.htm>